

甘霖
著

变

前 11 世纪以来至 21 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

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甘
霖
著

变

前 11 世纪以来至 21 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

局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
变迁/甘霖著.—2版(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549-6

I. ①变… II. ①甘… III. ①社会发展史—中国
IV. ①K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697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张志全

变 局

(修订版)

——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

甘 霖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265,000

2010年10月第2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49-6/K·1715

定价 42.00 元

再版序

十余年前写作本书时,作者约是三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思维活跃、敏锐,思想新颖、前瞻的时期,加上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相合,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就有了一些推陈出新的亮点。尤其是区域经济与政治这个主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凸显出来,相信本书的再版,能给关注这个主题的人们增加一份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此次再版,除了作文字上的订正之外,主要是增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恢复。初版时一些内容由于“敏感”而被删除,这一次得允悉数恢复(集中在最后一章)。二是补注。导论部分用注释的形式摘录了部分西方学者的相关观点,值得体会体会,也是作者个人这些年思考问题的深化和方向。

人类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二十二章)过去写这本书,是努力自己去思考和理解事物,属第一类头脑。这次修订再版,在导论部分用注解的方法把人类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和影响的观点选择出来,或作为比照,或作为补充,或作为鉴证,我以为属第二类头脑。当然,还有大量的问题存在,因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需要进一步去

探索研究。

上面这些话,权作敝帚自珍似的自说自话。

是为序。

甘 霖

2010年6月27日

自序

世纪之交,人人都在谈论 21 世纪。世界的新世纪究竟怎样,尤其是中国的新世纪究竟怎样?人们的认识,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历史。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尽沧桑。但近 160 年来的中国,与 160 年前的中国相比,发生的变化最大。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今天,毫无疑问也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下个世纪。怎样看待中国的历史,核心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本书试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瞻前顾后(从公元前 11 世纪的殷周之际到曙光初现的 21 世纪),考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自然形成了三大区域、两大地带。三大区域即大体以今长城地带和长江流域为两条界限,北方以畜牧经济为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粟黍类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文化区;两大地带即包括后两者的农耕地带和体现为前者的游牧地带。

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景观的丰富多样性主要在长城以南的两大区域内(农耕地带)得以展现,但传统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对峙、冲突、

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主题。

历史主题的转换,是中国社会发生既艰难又剧烈变化的重要根源。但从传统社会向新质社会的转变,早在宋代即露端倪,明中叶以后成为显著的现象,即出现本书所谓的“东南资本主义”。但区域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严重影响中国社会转变。而西方势力的侵入,则导致了中国社会自然转变和发展的独立行程的中断。在内外力量冲击造成的扭曲状态中,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痛苦的蜕变,相继经历了诸过渡社会的阶段;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格局,也经历了曲折的大转向。近20年中国社会的改革,是千年以来特别是近160年来中国社会转变的继续,在区域经济与政治领域有着深刻的反映,形成了迈向21世纪的良好势头。

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演进之中,大约前3000年是文明的萌生与形成期,中间1000年是文明的典型形态的成熟期,也是古代文明最具活力的时期,后1000年则是文明的转变期;进入21世纪,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第6个千年,中国社会经历千年蜕变终将转变到位,中国区域发展也将在21世纪形成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届时,也是中国重新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

本书创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贯通对数千年历史的认识。中国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惊人的连续性。但人们在具体问题上,往往难有一贯的认识。在现今的绝大多数著作中,古代和近代、近代和现代、现代和当代,结合之处常常脱节、断档,仿佛都出现了历史的大跃进,使得人们看不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导致认识上低水平的重复,而实践中则不免于重复错误。本书力求获得对历史的连贯的认识(当然仅是从特定的角度),看到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并在数千年的传统延续和千年的转变中开辟着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读者将会发现,本书在试图作出对历史常识的再认识,建立再认识

的新视角和新框架,因而并不特别经意于发掘新的材料,引用的资料也多出于常见的文献和著作。阅读这本书的任何部分,对于稍具历史知识的人并不会感到特别的困难;挑战在于,要用连贯的思路读完整本书(尤其是把长篇导论与正文内容密切联系起来)。

本书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长期观察、思考的产物。作者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就其中的主要问题和观点,与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从事不同职业(如学术界、企业界、政界等)的专家们进行过探讨,广泛地向他们求教,获益匪浅。现在把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对整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陈述,献给那些无论赞同与否但都在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并衷心希望获得指正。

目 录

再版序	1
自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传统格局的奠定(上)	48
历史的舞台	48
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区	52
区域分野	59
争霸兼并与社会变革	63
区域经济的勃兴	67
天下之中	73
第二章 传统格局的奠定(中)	81
秦皇汉武	81
经营西北	87
经济的南向扩展	93
南北对峙	99
南北统一与整合	105
南北经济文化的全面繁盛	110
第三章 传统格局的奠定(下)	116

唐宗宋祖·····	116
经济重心南移·····	124
北方经济的衰落·····	129
政治中心滞北与东移北转·····	137
大一统(上)·····	145
大一统(下)·····	152
第四章 传统格局的大转向(上)·····	160
东南资本主义·····	160
海上贸易的兴起·····	166
封建制度的自我调整·····	172
传统格局的牵制·····	180
大转向时代来临·····	189
第五章 传统格局的大转向(中)·····	199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99
开眼看世界·····	205
河海之会·····	212
蚕食与分割·····	219
“五族共和”·····	226
第六章 传统格局的大转向(下)·····	235
半资本主义社会·····	235
“二次革命”·····	241
再独立(上)·····	246
再独立(下)·····	254
再统一·····	259
第七章 传统格局的曲折转向·····	268
半社会主义社会·····	268

传统格局的逆转.....	276
“三线建设”.....	281
再转向.....	285
沿海发展战略.....	291
第八章 21 世纪的新格局	298
千年回眸.....	298
区域均衡:原则	304
区域均衡:东西—南北	310
海峡两岸暨香港.....	319
走向世界:远交近控	324
走向世界的新格局.....	331

导 论

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中国和中华民族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下述两个特点使她无论从某种特质上说,还是就总体而言,都鲜明地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是具有悠久绵长、从未间断的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在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权之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两者为主导因素所决定的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如何正确对待传统使之与现代世界潮流相契合,创造一个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发挥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社会环境,在解决世界最庞大人群的福祉方面,在复兴曾是最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方面,在探索实现人类进步的多种途径方面,作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贡献。

1

中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其内核,是长期封建国家、封建社会的存在。而在封建国家与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笼罩一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用政治的眼光观察一切,用政治的需要权衡一切,用政治的手段对付一切;行政权力高于一切,行政权力为一切的归宿。学术依附于政治,成为专制主义的统御之术;宗教依附于政

治,成为政治教化的得力助手;经济自不在例外,亦从属于政治需要,金钱与物质只能腐蚀政治权力,而不能在价值上超越政治。“政治一元化”可谓由来久矣。

“政治一元化”体制既是中国历史的特色,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保障,自有其历史的价值。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助于解决当时经济社会方面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比如,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都在大河流域(如黄河、长江、珠江等),水利建设是保障农业生产(当时代的主要生产部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没有发达的水利,就没有发达的农业。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发达农业基础之上的。水利建设是古代最主要的公共工程。实施这项公共工程,必然产生对公共权力也就是集中权力的需要。大江大河经常的泛滥成灾,是中华民族处于严酷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标志。防洪赈灾不仅造成对跨区域公共权力的需要,而且成为维护集权政治体制的重要调节器。^①

又如,古代中国区域内分布着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很大的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带。农耕民族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游牧民族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常常是一对矛盾,在正常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后者对前者的强力掠夺行为必然发生。农牧对峙与冲突,由来久远,而且愈演愈烈,是中华民族处于严酷生存环境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应付农牧对峙与冲突,也成为权力集中体制的一个持久的、重要的推动力。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不集中当时的有限资源不足以抵御军事上有天然优势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抵御这种压力是保存农耕文明的前提。即使是在

^① 地理环境因素在一个民族及其国家的早期具有决定性影响。“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部分第二章)“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三卷第十九章第十四节)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跨区域统治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游牧、农耕两大地带的统一和安定,仍然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①

治河、御边,历来是封建政权考虑的头等大事。封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朝廷)的效能,首先体现为这两方面工作的效能。一般来说,兴盛的王朝或王朝的兴盛时代,治河、御边都是卓有成效的,而河道不修、边备废弛,往往是一个王朝政府无能、政治腐败的标志。

由经济、军事上的需要出发,渐及于文化、宗教等方面,集权政治体制由产生而逐渐成熟、定型。中国在秦汉以后约一千九百年间(自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十六世纪),经济文化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与这种体制有直接关系;中国自明清以来约四百年间,经济文化开始落后以至长期停滞不前,也与这种体制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是,前者是正相关,后者是负相关。但作为历史传统,前后的连续性则是一致的、一贯的。尽管有战争、战乱,王朝交替,分分合合,都不曾彻底打断这种连续性;传统政治在这种连续性中代有加强。传统的连续性本身,即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直至与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力量相碰撞。

这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来自西方。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似乎正是相反的。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呈现二元状态。宗教曾经统治一切,至高无上;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较晚,而民主政治的传统可远溯古希腊;追求财富的重商主义更是历史悠久。资本主义首先从西欧中世纪的桎梏中

^① 军事需要强烈影响政治体制。“不受外来威胁,是治国最有力的指导者。即使对自由的热爱,过一个时期以后,也会服从于它的指挥。伴随战争发生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战争有一种牺牲立法权力增加行政权力的性质。”(《联邦党人文集》第八篇)“一场长期的战争,不是使国家因失败而灭亡,就是使国家因胜利而导致专政。这两个可能的结局,几乎总是必居其一。”(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部分第八章)

脱颖而出,并得到蓬勃的发展,不是偶然的。西方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分析思维发达,实验科学昌盛,产业分化逐次深入,社会管理日趋精细。就其内部来说,无意识形态的杯葛,法律已臻完备,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从容主动的气派。

相比之下,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矛盾和困难要大得多。西方文明力量的撞击,使中国古老的传统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虽经一百数十年的剧烈变化,仍然难以转变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要有一个清楚明晰、切合实际的发展方略,有一个适应长期的、多样化发展需要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反复争讼、社会规范的变动不居,使社会的各个方面、每个人对自己的当下行为和面向未来的努力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形成有利于发挥民智民力的社会环境。

明清以来,也许可以上延到宋元以降,中国政治状态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政治钳制经济的情况,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通过宫廷或军事政变,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改姓不改制,无论唐、宋、明,还是入主中原的元、清,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复制,而且愈益走向社会发展的反面;近代以来,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特别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专制君主被推翻,“孔家店”被打倒,改姓复制的链条终于被打断了,但民主政治并不因此而建立,专制主义并不因此被彻底打倒。革命的浪潮一波接一波,革命的任务似乎总是没有完成,还要不断地继续革命,直到发生空前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走进就革命而革命的死胡同。中国社会在内外力量不停顿的翻动之下,折腾来折腾去,元气大丧,代价惨重。^①

^① 美国的强盛和繁荣源于它在建国之初就致力于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

究其原因,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源,就是有新政治而无新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发育非常的成熟。所谓新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共产党宣言》)。不断发展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实是改变旧政治、旧社会的根本工具。但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整体水平低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直到进入近代社会之际,封建制度的堡垒仍然十分坚固,顽强地维护着既有的政治经济格局。

居全面优势地位的西方势力的强行进入,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立行程。新旧、内外两种势力较量的结果,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是从打破旧的上层建筑、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入手,用革命的手段解决当时急迫的政治问题。新政治由民族命运、外部压迫激变而生。由于没有新经济的配合作基础,新政治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名至而实不归。许多方面形式上成立了,实质内容上却打了不少折扣,从而为旧政治留下了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

考察中西历史,政治革命大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先立后破的革命,如法国革命、英国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这种革命打破了束缚资本主义发展、压抑资产阶级成长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外壳,使新生事物得以脱颖而出。^①一种是先破后立的革命,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必须打破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首先是打破旧的上层建筑的束缚才有立的可能。这是因为革命的因素主要是植入而非内生的,故旧的政治建筑坍塌之后,社会出

^① 马克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英、法、美等所谓“原生型”的现代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社会变革规律。

现某种真空状态,旧的势力还会以某种形式东山再起,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①

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属于后一类型。虽然经过多次革命,仍然不能说完成了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革命是必然的,打倒了旧势力的总代表—皇帝;第二次革命也是必要的,打倒了旧势力的基本力量—军阀、地主、官僚,同时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第三次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要打破旧的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一、二次革命,主要还是政治上、军事上的较量;第三次革命,则是要建立新经济与新文化,核心是工业化和市场化。显然,这种革命,其目标的达成,不可能靠激烈的、暴风骤雨般的手段来实现。这种类型的革命,因其广泛性、基础性而具有经过长期渐变的累积而后发生质变的特点,故有革命的实质但具改良的形式。改良的方式,体现为阶段性的循序推进。尤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变革,有其自身演进的规律,必须在长期过程中逐步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一、二次革命后,进入第三阶段革命,则需要有破有立,边破边立,以立为主,寓革命于建设之中。

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国革命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历史主题没有及时转换,^②尤其在重新获得独立与统一,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仍然不能摆脱“以马上得天下、以马上治天下”的惯性。如果说,在前两次革命的条件下,不破不立的法则发挥着作用,那么,进入革命的第三

① 虽然“后发”国家由于“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和实际造成的冲击,其所谓“植入型”现代化与后者“原生型”现代化有不同的特点,但仍然符合马克思所主张的基本观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867年第一版,序言)

② 查士丁尼,“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而且须用法律来巩固,这样,无论在战时或平时,总是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很好;皇帝不但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且能采取法律手段排除违法分子的非法行径,皇帝既是虔诚的法纪伸张者,又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法学总论》序言)托克维尔,“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版序)